

潇洒

新儒家

——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

张毅 著

与
敬畏

●无所住的清静心 ●真人修养

面对无尽的忧患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岳麓书社

●持敬、克己工夫

潇洒与敬畏

——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

张 毅 著

责任编辑 杨云辉

装帧设计 胡颖

潇洒与敬畏

——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

张毅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青山印刷厂印刷

199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0,000 印张:7.75 印数:1—5000

ISBN7-80520-615-5

G·68 定价:7.8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刘泽华

心灵中的空白

公元 1046 年的一天，准确地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 6 年的 9 月 15 日，范仲淹应在岳州巴陵郡担任太守的好友滕子京之托，为重新修建好的岳阳城西门堞楼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文章《岳阳楼记》。

登上岳阳楼的迁客骚人，面对着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奇秀景色，肯定会浮想联翩，产生不同的心境。然而，范仲淹在文中所表达的却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们的人格追求，这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后世的人们大多只注意赞赏范仲淹在文章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很少看出上面的那段话是范仲淹对中国士人们普遍心态的一种概括。

范仲淹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仁人志士

们“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这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处于忧虑之中，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认为这要等普天下的人都开心了，他们才会开心。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开心了。范仲淹的千古名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抱负，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却作了另一种安排，只要恪守范老先生的教导，士人们注定无快乐之时。然而即使如此，许多良知未泯的士人们仍在孜孜以求。

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学者大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特点用“忧患”二字来概括。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良心未泯，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都怀着对社会、人生、自我、文化等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许他们在一生中获得过许多乐趣，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作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现代心理学为观照古代士人的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我与自我、超我是

不同的心理层次，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和心理往往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识，于是，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论文便成为我们评论文人的惯例，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倘从心态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许多文不如人、人不如文的现象，这往往是一个人心理矛盾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处世、从政、为学，以及面对生死、忠孝、功名、酒色等问题上，常常是矛盾的。利害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杂陈始终积淀在士人们的心底，铺垫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许多学术著作深浸着浓厚的八股文，能不能采用一种新颖的文体通俗易懂地来向人们讲述古代那些被人们忽略了的旧事呢？能不能从心态的描述中发现中国古代士人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呢？评传、史传之类的学术著作是不是不面面俱到，不作广博的引证考据就不足以体现学者风度呢？

回想“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多少是艰涩枯燥的呢？那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幽默的文风、酣畅的文字常常使人过目难忘，也正是这种不假规矩的洒脱摆脱了学究气息，而展现出唐宋一代大家的风范。

我早就有心编撰出一部不具学术味而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来展示中国士人的复杂心态。

然而，我在笼子里呆的时间过久，让我飞也飞不起来，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今，年轻的学者张毅博士有志于这项工作，而且靠他的努力为历史奉献了这本清新脱俗的著作，使我的宿愿变成了现实，也更使我体会到换一种眼光、换一种笔调来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至少，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中又略去了一行空白。

1994年春于南开园

目 录

● 刘泽华：心灵中的空白	(1)
● 历史无言，却诉说着一切	(1)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2)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5)
中国士人的典型代表	(11)
● 面对无尽的忧患	(16)
文人的抉择	(18)
儒者的思考	(31)
两种觉悟和解脱方式	(40)
● 佛、道的生存智慧	(53)
无所住的清净心	(55)
“至人”境界	(68)
“真人”修养	(77)
昭昭灵灵的禅	(84)
道骨仙风	(96)
● 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107)
儒、释之辨	(108)
为去圣继绝学	(121)
持敬、克己工夫	(138)

为学方法.....	(152)
● 文心旷达，道心惟微	(167)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169)
大略如行云流水.....	(179)
十六字心传.....	(189)
孔颜乐处.....	(198)
● 魂归何处	(207)
作文之乐和读书之苦.....	(208)
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218)
是非谁人评说.....	(230)
● 引用书目.....	(239)

历史无言，

却诉说着一切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瞬间；
今之视昨，亦如明之视今。这就是历史。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行为的各个方面，既包括衣、食、住、行之类的有形的客观物质生活，也包括思想、信仰、情感等主观精神上的向往，后者同样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故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就从那里开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代表中国士人最高成就的杰出人物，透视他们全部人生历程和史实背后隐藏的思想，或许能对中国士人处世心

态蕴含的人性内容或人类社会生活所必存的某种永恒的根本性的东西有独到的感悟，增进我们对传统及现实中的人生和人心的理解。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无论从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是一个品类极为繁杂的阶层，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定位。他们主要由文人和儒者组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担负着知识传播和思想文化承传的任务。他们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可上可下之间，上则为朝廷重臣，达官贵人，名公巨儒，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下则浪迹江湖市井，困居山林穷野，破屋陋巷，薄汤淡饭，说不尽的穷愁潦倒。人生的大起大落，世事的白云苍狗，使他们在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何在身处逆境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问题上，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入思考和表达。用自己的言行为社会一般人提供处世的方法和行动准则，在精神和思想上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性格气质，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以自己的独特人格和博大思想影响他人，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成就的主脑式的文化伟人，毕竟是少数。但他们却巨人般地矗立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峰巅，引导着一代以至无数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走向。宋代的

苏轼和朱熹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提到苏轼，我们会想到他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词，想到他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瑰丽诗篇；想到他那清新神逸，蕴含丰富人生哲理和自然机趣，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前后《赤壁赋》，以及他那“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的文人画，和“刚健含婀娜”而无半点俗气的书法艺术等。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衡量，他都堪称文艺天才，是宋代最杰出的大文豪。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一种腾踔横溢的生命力的跃动，坦荡开阔的胸襟和潇洒自如的气度，一派乐观旷达、参透人生底蕴和自然奥秘的大家风范。可是谁能想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深微沉重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呢！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尽管他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二十二岁通过进士考试而名震京师，可步入仕途后却命运多蹇，屡遭不幸。如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晚年又一再遭政治迫害，贬官英州、惠州、雷州、儋耳等蛮荒边地，白发飘萧而携子渡海，流放到天涯海角。可以说，对人生虚幻和命运无常的痛苦体验，当时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苏轼的。但他却能在身处逆境时，也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和潇洒走一回的无畏，令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也奈何不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人格和处世心态呢？是何种精神力量和人生哲学使他坦然面对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磨

难，在审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升华和解脱，乐而忘忧呢？

在当时，不仅文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难以见容于高度封建集权专制的社会政治生活，就是以“卫道”者自居，把体现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纲常伦理视为“天理”而心存敬畏之意的儒者，也常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进退失据，饱尝理想失落的痛苦。这在朱熹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他死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朱文公”，赐太师名号，追封信国公。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亲自作序，将朱熹所作“四书”与《五经》颁行于天下，作为一切士人必读之书。至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又命人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颁行全国，他称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朱熹神化为万世圣人，要人们膜顶礼拜。可就是这样一位儒家大圣人，生前却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自幼颖悟好学，年仅十九就登科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作为儒者，他抱有绍道统，立人极，为帝王师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以少量的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当他想把自己理学的“毛”附着于朝中相党的“皮”上而成为一种有作为的政治力量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逆党籍，成为朝廷法律确定的大逆不道的罪人。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出冤假错案，但对于一个有志于

“补天”的卫道者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灾难和信念危机。

那么，他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支配着他渡过其悲剧性的一生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从当时士人所特有的处世心态入手，把一个时代士人的哲学观、人生观和政治态度还原为现实中活生生的文化心态和人格追求，方能得到真正的了解和阐释。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所谓的“处世心态”，关系到在社会如何做人的问题，属于中国士人生命追求的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问题。宋代士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既源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又受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影响，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行为模式。

儒学作为入世的人生哲学，原有内外两个方面，于内可正心、修身，于外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是“内圣外王”。但“内圣”属于个人道德修养，是一种价值信仰和人格追求，具有相当的空灵性；而“外王”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功业，是实实在在之事。从逻辑上讲，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的“内圣”之人，未必能建立起政治上的实际功业，而历史上能成王称霸之人，也很难说就一定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但儒家的学说却将两者视为一体，鼓吹王道合一，政教合一的“王道”。认为道德即政治，要求从事社会政治活

动的人必须是圣人和贤人，把重视个体人格道德修养的“内圣”，导入“外王”社会的王道政治之中。因此忠君报国就成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士人的主要人生追求和做人标准，其济世救民的高尚情操多出于为君国分忧的考虑，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但这样一来，也易造成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心理失衡。因为从王道合一和道德即政治出发，自然会得出君王是最高的道德评判者和政治即道德的结论。当士人在政治上无功业可言，甚至还遭政治权威君王的贬谪时，他就只能自称罪人，所谓“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很难再以具有完满道德人格的圣贤自恃了。所以自魏晋之后，中国士人尽管在理智上、思想上仍信奉儒家学说，可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却更喜爱佛老之说了。

宋代是儒学复兴时期，这种复兴首先体现为唤起士大夫阶层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范仲淹提出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所以北宋的士大夫文人多具政治改革热情，希望通过改良或变法富国强兵。当时，欧阳修、王安石和青年苏轼等一大批文人作家，写了大量的政论文和议论时政的诗歌，充满“有为而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但论政、议政是一回事，实际上的政治运作又是一回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固然痛快，可政治斗争中的你争我斗、福祸难测却令人生畏，以至生厌。随着“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士人在这些政治改革的经世活动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宦海沉浮，有才华、有抱负的文人作家心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压

抑与悲愤，需要一种精神上或生理上的慰藉和存养。

这时，道家那种带有虚幻色彩的人生贵得“适意”的逍遥哲学和审美情趣，中国化的禅宗那种“性自清净”的觉悟解脱，就成为士人化解痛苦和忧愤，保持心理或生理健康的良药。道家认为人处在“人间世”是有待的，无半点自由可言。只有摆脱了外在的名誉、利害和物欲的束缚，以超功利、超道德的眼光看待生活，返回到生命的自然存在状态，无思无虑，顺应本然生命，让自身的生机显发，才能保持住人格的完整。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心灵适意，达到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 的逍遥游，以成就所谓的“真人”。

这种本然生命之“真”，与“人间世”各种人为的名教仁义不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而佛家所说的“佛性”，作为人能成佛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故中国的士人在用“格义”的方法去诠释佛学时，常用带有庄玄色彩的“真如”一词去说明“佛性”，用道家所说的“无”比附释家的“空”。当中国化（实即士大夫化）了的佛学禅宗产生之后，佛老庄禅在许多方面都趋于一致。不同的是，道家返归自然的人生哲学到后来更偏重于向炼气养生方面发展，成为一种气术；而禅宗的“以心传心”的觉悟解脱方法更注重本心的直觉顿悟，将道家追求的人生适意升华为更加空灵、更加无滞无待的禅悦，以成就本性自足、“常乐我净”而圆成顿悟的“真如”之境。

禅宗觉悟成佛的心性论和道家返归自然的逍遥、齐物之旨相结合，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不仅能使士人在人生失意时

得到解脱，而且也契合文人创作中追求个性发挥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格调。所以苏轼之后，宋代作家在将生活艺术化的审美创作活动中，往往以禅喻诗和以禅论诗，将诗道与禅道相提并论。而作家的文章作法，常常就是他的活法，是其处世态度的表现形式。道、释的适意禅悦和精神自由思想，对于中国文人尤为至关重要，成为他们在社会上为文做人的最终出路。它能使士大夫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德和政治的重负，有一种自然行文的潇洒气度，活得不致于太累。避免了西方作家那种因理想与现实难以妥协而导致的精神分裂和自杀行为的产生。

但是在生命意义的根本追求方面，道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真人境界，佛家视人生如苦海而要一切解脱的真如佛性，是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消极办法，带有追求个体生命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价值的倾向。这虽有利于文人生命的自由发挥和审美创作中的神与物游，极尽潇洒自得之趣；但若施之于社会生活，则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维系社会稳定的名教纲纪的价值标准失去约束力。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自由总是有限的，个体的个性意识必须符合群体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一点上，以“醇儒”自居，追求成圣成贤的理学家，对以佛老庄禅为依归的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尽管理学家为学都要经历过一个出入佛老而返归儒学的阶段，并在修养方法和思维方式方面吸收改造某些佛老学说；但他们认为学做圣人，做有德行的仁人志士是人生的第